



學海堂與晚清嶺南學術文化

[美]麥哲維 著

沈正邦 譯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





〔美〕麥哲維著 沈正邦譯

學海堂與晚清嶺南學術文化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學海堂與晚清嶺南學術文化 / (美) 麥哲維著；沈正邦譯。—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3

(嶺南文庫)

ISBN 978-7-218-12364-6

I. ①學… II. ①麥… ②沈… III. ①書院—研究—廣東—清後期 ②學
術思想—思想史—研究—廣東—清後期 IV. ①G649.299.65 ②B249.0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296999 號

Xuehaitang Yu Wanqing Lingnan Xueshu Wenhua

學海堂與晚清嶺南學術文化

[美] 麥哲維 著 沈正邦 譯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蕭風華

責任編輯：夏素玲 周驚濤

責任技編：周傑 易志華

裝幀設計：@亦可文化

出版發行：廣東人民出版社

地 址：廣州市大沙頭四馬路 10 號（郵政編碼：510102）

電 話：(020) 83798714（總編室）

傳 真：(020) 83780199

網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恒美印務（廣州）有限公司

開 本：640mm×970mm 1/16

印 張：46 插 頁：12 字 數：562 千

版 次：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1—2000

定 價：190.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出版社（020-83795749）聯繫調換。

售書熱綫：(020) 83795240

ISBN 978-7-218-12364-6



9 787218 123646 >

《嶺南文庫》前言

廣東一隅，史稱嶺南。嶺南文化，源遠流長。採中原之精粹，納四海之新風，融匯升華，自成宗系，在中華大文化之林獨樹一幟。千百年來，為華夏文明的歷史長卷增添了絢麗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進入 19 世紀的南粵，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成為近代中國民族資本的搖籃和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啓蒙之地，繼而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策源地和根據地。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廣東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鬥爭中前仆後繼，可歌可泣，用鮮血寫下了無數彪炳千秋的史詩。業績煌煌，理當鐫刻青史、流芳久遠。

新中國成立以來，廣東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摧枯拉朽，奮發圖強，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中卓有建樹。當中國社會跨進 20 世紀 80 年代這一全新的歷史階段，廣東作為國家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試驗省區，被置於中國現代化經濟建設發展的前沿，沿改革、開放、探索之路突飛猛進；歷十年艱辛，轟轟烈烈，創造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空前偉績。嶺南大地，勃勃生機，繁花錦簇，碩果累累。

際此歷史嬗變的偉大時代，中國人民尤其是廣東人民，有必要進一步認識嶺南、研究嶺南，回顧嶺南的風雲變幻，探尋嶺南的歷史走向，從而更有利於建設嶺南。我們編輯出版《嶺南文庫》的目的，就在於予學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

之園地，并幫助廣大讀者系統地了解嶺南的歷史文化，認識其過去和現在，從而激發愛國愛鄉的熱情，增強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高瞻遠矚，繼往開來。

《嶺南文庫》涵蓋有關嶺南（廣東以及與廣東在歷史上、地理上有密切關係的一些嶺南地域）的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包括歷史政治、經濟發展、社會文化、自然資源和人物傳記等方面。並從歷代有關嶺南之名著中選擇若干為讀者所需的典籍，編校注釋，選粹重印。個別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譯著，亦在選輯之列。

《嶺南文庫》書目為350種左右，計劃在五至七年內將主要門類的重點書目基本出齊，以後陸續補充，使之逐漸成為一套較為齊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庫，並作為一份有價值的文化積累，在祖國文化寶庫中佔一席之地。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一九九一年元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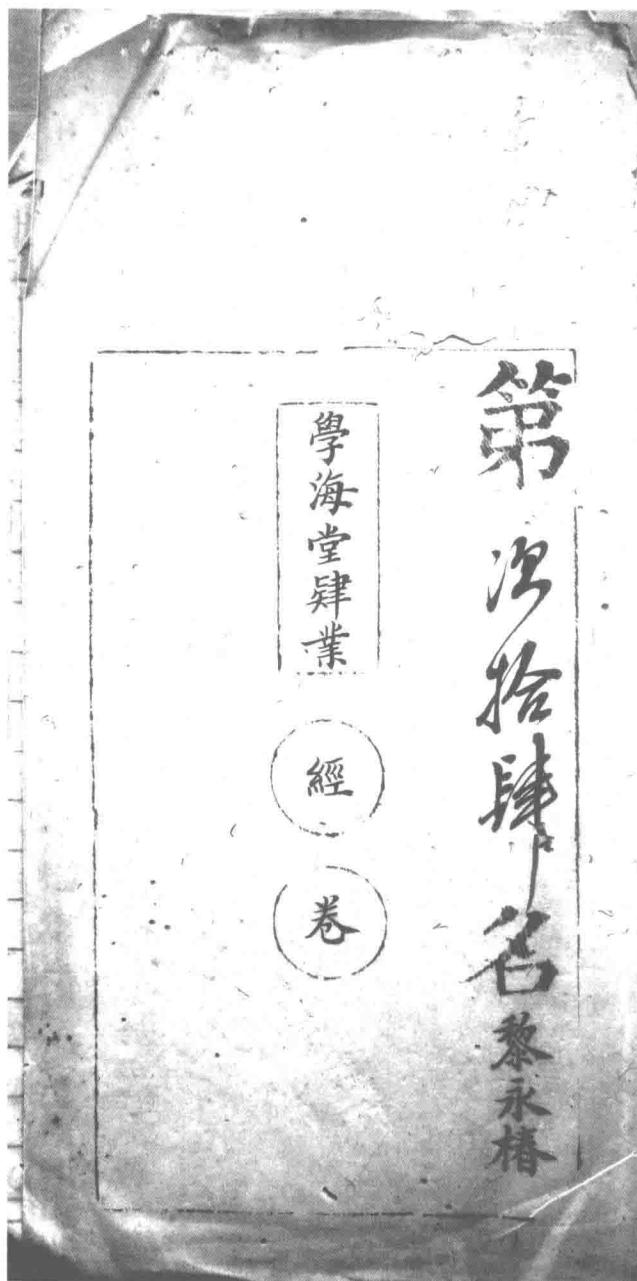
圖一 阮元像（圖一至圖三選自葉衍蘭、葉恭綽編《清代學者象傳》）



圖二 陳澧像



圖三 朱次琦像



圖四一1 學海堂肄業經卷（圖四、圖五由小古堂書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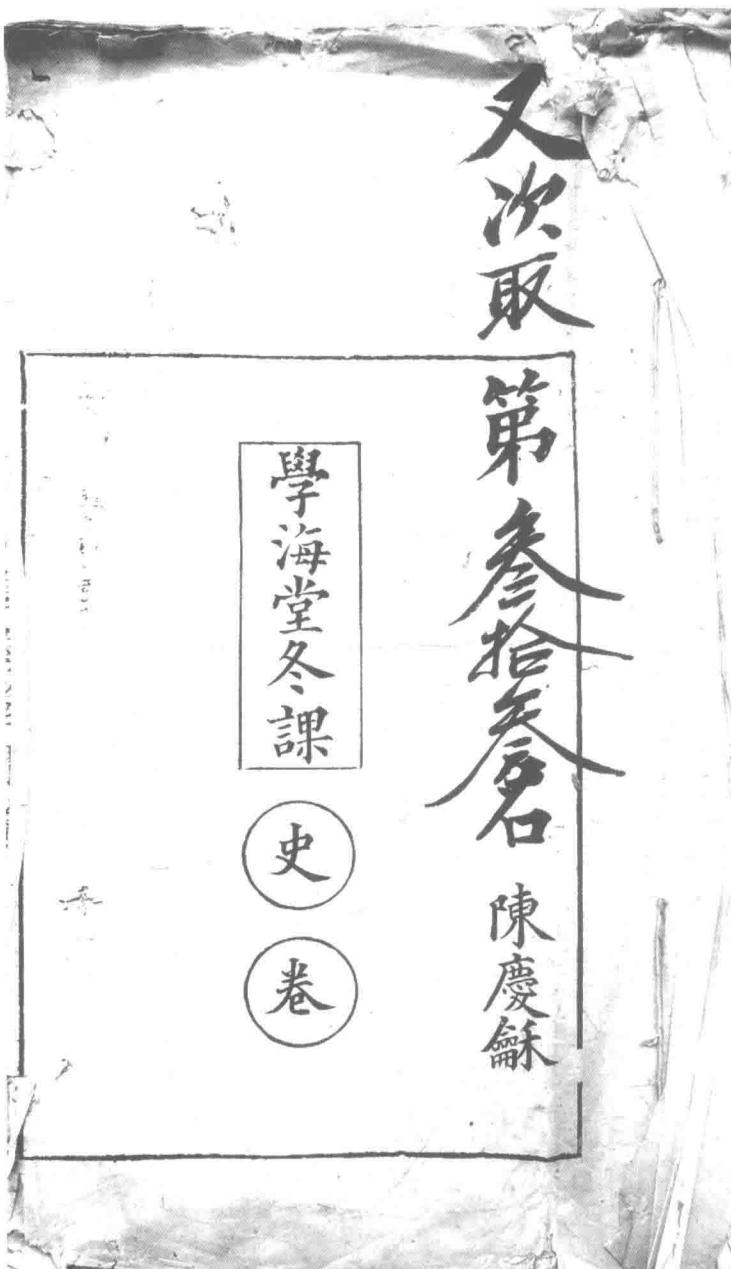
朱子注書不無偶有誤處此辨
駁正喜辭之說引據頗詳

駁正喜

笙詩有辭無辭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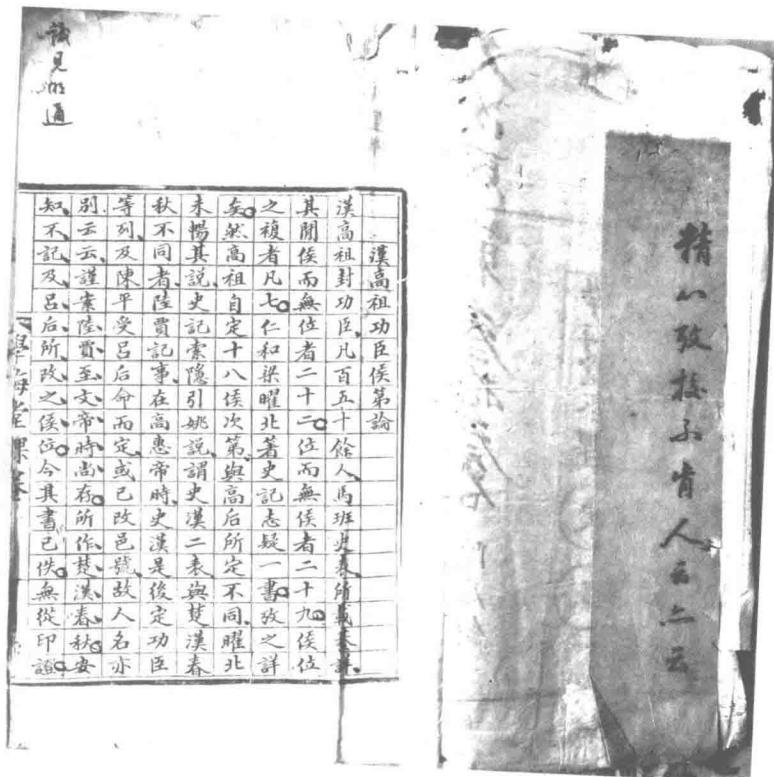
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是也
鄭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
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謹案此鄭說則戰國以
前六篇皆有其辭其後乃亡之耳惟劉原父謂
笙詩有聲無辭爲朱子集傳之所本顧氏廷綸
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七字毛公所著朱子讀

圖四一2 學海堂肄業經卷



圖五一一 學海堂冬課史卷

精於致極小青人玉二云



圖五一—2 學海堂冬課史卷

超越地方史的華南研究（中譯本序）

程美寶

麥哲維與我或許可以稱為“同窗”。求學時他在北美，我在英倫，當然從沒做過同學，不過我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因研究廣東之故，都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和文德路上的孫中山文獻館讀過書，一定曾坐過同一扇窗下。但當時我與他未曾謀面，只在圖書館聽說，有一位正在研究學海堂的美國博士生，查看古籍時常會調閱經部典籍，初踏史學門檻的我，聞此不禁生出慚愧之感。那些年，我們沒有在廣州相遇，但在往后的日子，由於彼此都關注清代省城士子的文化活動，也很自然地由最先的神交，到常在學術會議上面晤切磋，後來他多次寄寓羊城，總會同我們一群中山大學的朋友混在一起，儼然成了我們的同仁。

《學海：十九世紀廣州的流動性與身份證同》這本書（中譯本定名為《學海堂與晚清嶺南學術文化》），是麥哲維在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他畢業未幾，我就讀過他的博士論文，深為折服，一直期待着他早日出版這部歷經十數載寫成的力作。不過，到 2006 年成書出版時，當我看見主標題改用“The Sea of Learning”，而非博士論文原來的題目“Local Matters”時，感到有點意外。我當時覺得，“Local Matters”比起“The Sea of Learning”來得更切題、更有力。後來，我當面向他表達了這個意見。當然，我也能理解他的一些考慮，儘管他原來用“local matters”一詞，是為了語帶相關，但不

論在中文或英文的語境中，“本地”或“地方”總予人狹隘之感。事實上，雖然以華南作為“地方”的研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是中國研究的熱點，但到世紀之交的年代，許多歐美的中國歷史研究者已經放眼中國更廣大的地區，許多博士生也紛紛到中國其他口岸或內陸城市開展地方研究，再以華南為題目，似乎就沒有更多的新鮮感了。我相信，他肯定為這個書名費煞思量，我作為旁觀的讀者，應該更多地去理解作者的苦心孤詣。

然而，“華南”何止是華南？“地方史”又豈僅關注地方？在用英文出版的中國歷史著作中，以華南為題享負盛名者，當數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1966年出版的《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該書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在中國大陸出版中譯本以來，成了中國近代史學生必讀的經典。也許很少人會特別留意在導言部分，魏斐德是這樣結束的——

由是，探討太平天國的源起，終究轉化成另一種研究，也就是解剖一個新的歷史單元——省城、廣州，廣東、華南——這個歷史單元有它內在的連貫性。

讓我們投身地方歷史研究吧。

“讓我們投身地方歷史研究吧。”——這句話沒有用上感嘆號，也許魏斐德是用沉着的語氣作出這個呼籲的。他肯定知道，這條地方歷史研究之路何其修遠；他更加清楚，這樣的提倡會很容易引起誤會。所以他說，地方史、帝國史和世界史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說，“世界史織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織出了世界史，而中國也改變了”。

麥哲維的《學海》一書，可說是對魏斐德這種主張的一個

有點遙遠但又十分逢時的呼應。說遙遠，是因為兩部著作的出版年代相差幾近半個世紀；說逢時，是因為與魏斐德當年材料有限的情況比較，麥哲維能够利用的史料以及相關的研究成果已經豐富許多；說是呼應，是因為儘管《大門口的陌生人》出版之後，中、英、日文學術界陸續出版了不少華南地方史的著作，但並非每部都能够在方法和視野上令人眼前一亮。作為麥哲維的朋友，我不好為他吹噓，說他這部著作如何鶴立雞群，如何能比美《大門口的陌生人》，因此我審慎地用“呼應”一詞，或有“庶幾近之”的意思吧。

本書雖以“學海”為題，却絕非僅談學海堂這個機構，而是要更深入去探究魏斐德所提出的那個有內在連貫性的“歷史單元”——省城—廣州、廣東—華南，也就是承托學海堂的社會基礎。如許多治思想史者所言，阮元創立學海堂，是要在粵東提倡樸學，一洗明代以來白沙甘泉之學束書不觀、不立文字之流弊；但阮元的舉措，必須得到本地學人的擁護和商人的贊助，方能成事。那麼，到底積極參與建立和經營學海堂的本地文化精英是些什麼人？既然學海堂在省內外那麼風光，為什麼會有另一些本地文化精英却選擇與學海堂劃清界線，或至少保持距離？他們到底擁有什么資源，得以各自作出安身立命的不同選擇？這些問題，關乎相關歷史人物的浮沉升降，當中也不免呈現出他們在不同時候的自我表述，這就是此書副標題的兩個關鍵詞——“流動性”和“身份認同”的關懷所在。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作者除了鑽研時人的經學著作外，還運用了大量地方文獻，包括族譜、日記、自傳、詩集和文集等等，盡量將其所要研究的“思想家”，置於一個具體的地域和社會情境中，來討論他們的行為與表述。正因為如此，作者在撰寫此書的過程中，其學術取向也從傳統意義的思想史，延伸到地方社會文化史。麥哲維試圖將研究對象的學術關懷和表述，他們的

家世和個人生活經歷，以及 19 世紀廣東省城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發生的社會變遷聯繫在一起討論。他在“致謝”中說，希望自己無負導師蓋博堅教授（R. Kent Guy）所望，寫出一部思想家的歷史（*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而非僅僅是一部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讀畢此書，我們就知道他不但已經實現了其導師的期望，而且在很多方面的討論，已經超越了他自己原來設想的範疇和深度。

循着作者這樣的問題意識去思考，“本地”這個範疇就變得可堪玩味。誰才算是“本地人”？所謂“本地”究竟是誰的本地？麥哲維在書里一開始比較了省城和珠江三角洲腹地在定居形態方面的差异，揭示了“本地人”的複雜性。興辦學海堂的主力，包括提供捐助的行商和部分學長，很多出自原籍在江南或福建，在廣東省城定居只有三四代的家庭，與這些居住在都會中來自五湖四海的新近移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更早扎根於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大族。明清之際，通過長年的沙田開發和對水利以及漁業等其他資源的爭奪，珠江三角洲地區陸續形成了很多控制地方社會的大宗族，商業化市鎮也相繼興起。十八世紀以後，珠江口的泥沙沖積造成新的灘涂迅速擴展，通過大規模投資進行人工圍墾，成為加快“新沙”形成並獲得占有權的主要途徑，在省城經營貿易的新興勢力與在鄉鎮中的大族均熱衷於投資沙田開發。學海堂的部分經費，就是靠省城行商擁有的沙田產業支持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新移民還是老“移民”，或採納移民傳說來敘述家世和定義身份的土著，都經歷了一個“成為本地人”的過程，位於省城的學海堂正是他們創造身份的其中一個活動舞臺。

這個“成為本地人”的過程，在麥哲維的筆下，成為學海堂內外的學人治學取向的寫照。祖輩來自江南的陳澧，雖入籍番禺，以廣州人自居，在某些具體的場景中會把自己和“外省

人”區分開來，但他多次回江南故里省墓，修纂宗譜，兩次到揚州探訪阮元，還與其他江南學者頻繁通信聯絡。麥哲維認為，陳澧的這些行為，都有重建他的江南之根（recreate his Jiangnan roots）的企圖。較諸廣東而言，“江南”所象征的文化氣息，成了陳澧強化自身的學術地位的某種資本。在學術發展方面，中年的陳澧自信已深諳考據之學，開始致力於探尋經典中的微言大義，這就是所謂“調和漢宋”的取向。作者指出，這種學術主張決非陳澧獨有，也是當時許多其他廣州學人的追求。其實，陳澧在許多方面並不認同宋儒和明儒的學說，他考究義理，絕非要恢復宋明理學。陳澧和他的同儕所追求的，是通過證明朱熹也講考據，漢儒也談義理，來達致漢宋調和的理想。隨著老一輩行商的離世，陳澧通過調用其他資源，建立書局，將學術著作出版的中心轉移到學術機構中去，扭轉過去偏重依賴行商贊助出版的局面，為學海堂也為他自己建立起一個難以動搖的學術地位。

與陳澧形成強烈對照的是朱次琦。在廣東學術史上，朱次琦與陳澧齊名，但他以不就學海堂學長之職的姿態，刻意與學海堂劃清界線。朱次琦在去世當年知道自己難以在生前完成計劃中的學術著作，乃把書稿盡行焚毀，故其傳世的著作不多。作者難以詳細勾勒朱次琦的經歷和思想，但他靈活地運用了朱次琦為自己宗族編纂的《朱氏傳芳集》和其他一些零碎的材料，向讀者展示朱氏世居的南海九江鄉的經濟和社會實力，如何讓朱次琦不必依靠學海堂也可建立自己的學術聲譽。其實，在經學研究取向方面，朱次琦和陳澧在很多方面不謀而合，他也追求漢宋調和，也在考據學方面顯示過他的功力，但他對於學海堂制度化的考據學訓練乃至省城的學風，却因為無須依傍學海堂而能够作出更直接的批評。相對於陳澧在理念上強調自己的“江南”根源，而實際上立足於廣東省城的自我定位而